

21世纪国际关系学系列教材
Textbook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Classical Reading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西方国际关系 理论经典导读

秦亚青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Classical Reading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西方国际关系 理论经典导读

秦亚青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经典导读/秦亚青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
(21世纪国际关系学系列教材)
ISBN 978-7-301-13554-9

I. 西… II. 秦… III. 国际关系理论-西方国家 IV. D8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43622号

声明:本书为教学参考目的摘选了部分其他出版机构的作品,感谢相关机构和著译者许可出版,并请那些我们未能联系上的著译者或出版者尽早与我们联系,我们将按规定敬奉稿酬,非常感谢!

书 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经典导读

著作责任者:秦亚青 编

责任编辑:徐少燕

封面设计:春天书装工作室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3554-9/D·2019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印刷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2印张 387千字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6.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前 言

本书收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名著节选和重要论文,可做教材或教学阅读材料使用,目的是使读者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一个比较系统和全面的了解。本书编排的基本依据是学派、学者和学理,亦即以学派为骨架,以学者为筋节,以学理为脉络,通过选取各学派重要学者的代表性作品,反映国际关系学的基本理论和发展历程。

首先是学派。我们确定了一个框架,按照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以及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四个部分来表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流派。这主要是参照了通行的国际关系理论分类方法。一方面,它有着高度的合理性,使人们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派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因此也就比较容易地把握学术思想的争鸣与发展。另一方面,它也有着一定的片面性,不一定能够得到所有学者的认可。再者,有的学者毫无疑问属于某一学派,不仅自己承认,而且大家公认,比如摩根索属于现实主义学派(当然,根据阿什利的二次识读方法,摩根索也不是现实主义者);而有的学者则不是这样毫无争议,可能他们自己不承认属于哪一学派,学界对他们属于哪一学派也有不同看法,比如布赞。但总起来说,四个类别基本包含了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学派和主要思想,这样做也便于读者理清头绪,把握知识体系。

其次是学者。理论是学者构建的,重要理论是重要学者的思想产品。没有学者,就没有理论。如果说理论是有体系的思想,那么,这些思想深深打上了创造者的烙印。也就是说,理论是人创造的(当然不是人随意创造的),所

以,重要学者是这一读本选取文章的重要标准。以现实主义为例,选了卡尔、摩根索和沃尔兹。这三位学者都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可以说是这一理论学派发展的里程碑式人物。再如,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部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是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宏大理论;考克斯的文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分析了社会力量对国际关系的意义和影响;阿什利游走于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对新现实主义的贫困做出了深刻的批判。这些学者的思想交锋,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传统,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他们的著作,作为国际关系学的学生,大概不能不读,或许还不能只读一遍。

第三是学理。这涉及两个方面。首先我们选取的是理论取向明显的学理性文章。大部分文章是选自重要学者代表作中的精华篇章。比如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讨论政治结构的一章:政治结构是沃尔兹理论的核心;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提出三种无政府文化的部分:多元无政府文化是建构主义的创新。这些部分是学理性很强的论述,告诉我们学理研究的精要和理论探讨的路径。其次是学理发展的历史脉络。所选文章代表了理论学派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比如现实主义,卡尔代表了两次大战期间的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诞生;摩根索代表了二战后的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想体系的建立;沃尔兹代表了冷战高峰期间的现实主义和科学现实主义的建立。纵观这些文章,应能大体了解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轨迹和研究取向。

选编此书,为的是教学的方便,也为了学生能够通过阅读原著对国际关系理论有一个直接的了解。感谢耿协峰博士想到了这样好的一个主意,感谢责任编辑徐少燕同志一丝不苟的工作,也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力帮助。囿于本人水平和诸多条件限制,难免多有不妥之处,还望读者谅解。

秦亚青

2007年2月20日于京西厂洼

目 录

第一编 现实主义

- 现实主义对乌托邦主义的批判 爱德华·卡尔 /3
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学派 汉斯·摩根索 /25
政治结构 肯尼思·沃尔兹 /40

第二编 自由主义

- 世界政治中存在着秩序吗? 赫德利·布尔 /67
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 罗伯特·基欧汉 约瑟夫·奈 /90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无政府假设 海伦·米尔纳 /124

第三编 建构主义

- 规则与世界政治的建构 尼古拉斯·奥努弗 /149
是什么因素将世界维系在一起?
——新功利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 约翰·鲁杰 /173
国际体系的三种无政府文化 亚历山大·温特 /219

第四编 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

- 世界体系理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251
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
超越国际关系理论 罗伯特·考克斯 /263
新现实主义的贫困 理查德·阿什利 /306

第一编 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对乌托邦主义的批判

爱德华·卡尔

爱德华·卡尔(Edward H. Carr, 1892—1982) 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家、历史学家、外交官。代表作《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写于1937年,出版于1939年,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卡尔也因之享有“现实主义之父”的称号。

在本文中,卡尔从三个主要方面批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盛行的威尔逊理想主义。第一,在近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普世道德是很难界定的,国家只能在道德与权力之间寻求平衡。第二,权力是国际关系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权力可以表现为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支配舆论力量三种形式。没有国家权力,国际组织只能是空中楼阁,国际法也只能是虚幻的法律。第三,国家之间利益和谐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利益冲突才是国际关系的实质和事实。道德的虚幻性、权力的重要性和国家利益的冲突本质构成了卡尔现实主义的三个核心观点,也为后来的现实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卡尔首次明确提出了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这一理论不但预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还促成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争鸣的学科发展局面。

现实主义的基础

现实主义进入国际关系领域的时间要比乌托邦主义晚得多,而且还是通过批判乌托邦主义而进入这一领域的。的确,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已经很熟悉“公正是强者的权利”这一说法了。但是,现实主义者一直处于无足轻重的少数派地位,他们为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之间的鸿沟感到困惑,因此表达一点不同声音而已。在罗马帝国和后来的天主教廷统治时期,这根本不是问题,因为罗马帝国以及后来天主教廷的政治利益被视为与道德准则是一致的。只是在中世纪体系解体之后,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之间的鸿沟才成为一个尖锐且富有挑战性的问题。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是第一个重要的政治现实主义者。

马基雅弗利的出发点是反对当时政治思想中的乌托邦主义。他说:

我的目的是写一点东西,使理解我的人受益。我认为,最好是认识事物的真相,而不是遵从幻想。许多人想象出一些共和国和君主国,但是没有人见过并知晓这样的国家。人的实际生活与人应当怎样生活是相去甚远的两件事情,如果一个人只求应该怎样做事而忽视了实际上怎样做事,那么,他不仅无法保全自己,反而会走向灭亡。

马基雅弗利理论包含着三条基本原则,构成了现实主义哲学的基石。第一,历史是一系列因果关系发展的结果,其发展历程可以通过理性的方式加以分析和理解,但不能像许多乌托邦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可以通过“想象”而创造出来。第二,理论不具有乌托邦主义者所设定的功能,理论不能创造实践,但实践可以创造理论。用马基雅弗利的话说,“无论何种忠告都是源于君主的智慧,而不是君主的智慧源于忠告。”第三,政治不是乌托邦主义者所想象的政治,政治不是由伦理决定的,而伦理则是由政治所决定的。“规矩使人诚实。”马基雅弗利认识到道德的重要性,但也认为,没有有效的权威便没有有效的道德。道德是权力的产物。^①

马基雅弗利对正统乌托邦主义的挑战是强有力的。一个极好的例证就是,在他著书立说四百年之后,贬低政治敌人的最强烈语言仍然是将其称为

^① Machiavelli, *The Prince*, chs. 15 and 23 (Engl. Transl., Everyman's Library, pp. 121, 193).

马基雅弗利的信徒。^① 培根 (Bacon) 是第一个称赞马基雅弗利的人。他说马基雅弗利是“坦诚直言人的实际行动,而不是人应该怎样行事”^②。从此之后,没有一个政治思想家可以忽视马基雅弗利。法国的博丹 (Bodin)、英国的霍布斯 (Hobbes)、荷兰的斯宾诺莎 (Spinoza) 都声称在新的理论和构成最高伦理准则的“自然法则”之间发现了一条中间道路。实际上,三人都是现实主义者。牛顿时代使人们第一次认识到可能依照物理学的方式构建政治学。^③ 拉斯基 (Laski) 教授写道,博丹和霍布斯的著作“将伦理与政治分离开来,在理论层面完成了马基雅弗利在实践领域对两者的区分”^④。霍布斯说:“在正义和非正义的概念出现之前,必然先有某种强制性权力。”^⑤ 斯宾诺莎认为,务实的政治家对人们理解政治做出的贡献要超过理论家,“尤其要超过神学家”。因为“政治家是在经验的课堂里经受教育,因此,他们所思所想的全部是那些对实际有用的事情”^⑥。在黑格尔之前,斯宾诺莎就断言:“每个人的行为都遵循着自然法则,遵循着最高的自然权利。”^⑦ 这就为决定论开启了大门,于是,伦理学从根本上说也就成为对现实的研究。

不过,当今的现实主义与 16、17 世纪的现实主义有一个根本的不同。无论是乌托邦主义还是现实主义都接受了 18 世纪的进化理念,并将这一理念融合到自己的理论之中。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种不仅有些奇怪而且似乎荒谬的结果:现实主义似乎比乌托邦主义更具“进化”色彩。乌托邦主义将其对进化的信念移植到对绝对伦理标准的信仰,而绝对标准就其本意来说包含了一种静态性质。现实主义没有这种根本假定,所以越来越具动态性和相对性。进化成为历史进步的内在成分,人类不断向目标前进。当然,这种目标没有明确的定义,不同的哲学家对其也有不同的说法。现实主义“历史学派”起源

① 可以引用两个最近的十分有趣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汤因比教授在《国际事务概述》中讨论纳粹革命的一章中声称,国家社会主义“实现了……马基雅弗利……提出的理想”;他在该书同一章的另外两节中也用相当大的篇幅重申了这一观点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34*, pp. III, 117—119, 126—128)。第二个例子是,1936 年 8 月在莫斯科审判 Zinoviev, Kamenev 以及其他人的时候,公诉人 Vyshinsky 引用了 Kamenev 文章中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 Kamenev 将马基雅弗利赞扬为“政治艺术大师和睿智的辩证学家”。公诉人指控 Kamenev “接受了马基雅弗利的理论”,并“将其发展到恬不知耻和丧失道德的极致” (*The Case of the Trotskyite-Zinovievite Centre*, p. 138—139)。

② Bacon, *On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vii. ch. 2.

③ 根据霍布斯图式,“除了最初发现的动力定律,没有新的动力和原则在理论上能够占据一席之地。存在的只不过是机械因果关系的复杂案例而已” (Sabin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p. 458)。

④ Introduction to *A Defence of Liberty against Tyrants (Vindiciae contra Tyrannos)*, ed. Laski, p. 45.

⑤ Hobbes, *Leviathan*, ch. xv.

⑥ Spinoza, *Tractatus Politicus*, i. pp. 2—3.

⑦ Ibid. Introduction.

于德国,它的发展要归功于两位伟大的思想家——黑格尔和马克思。但西欧的国家和学派在19世纪中后期无一例外地受到了这一思想的影响。这一发展一方面使现实主义摆脱了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等思想家赋予它的悲观基调,但在另一方面,也使现实主义的决定论色彩更加明显。

自从有了文字历史,也就有了因果关系的概念。但是,以前人们相信,人类事务一直处于上帝的监控之下,并时而受到上帝的干预。在这种信念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就很难出现建立在有规律的因果关系基础之上的历史哲学。后来,黑格尔以理性代替了上帝,因此,他可以率先建立起一种基于理性历史进程概念之上的哲学体系。黑格尔一方面假定存在一个有规律、有秩序的进程,另一方面也满足于以形而上的抽象形式表述了这一进程的推动力量,这就是他所说的时代精神。但是,现实的历史概念一旦得以确立,就很容易用一种比较具体的物质性力量替代黑格尔抽象的时代精神。马克思并没有发明历史的经济理论,但他发展了这一理论并使其普及开来。大约在同一时期,巴克勒(Buckle)提出了一种用地理学方式解释历史的理论。这使他相信,在人类事务之中,“贯穿着一个普遍存在、始终如一的规律原则”^①。他的这一观点以地缘政治学的形式表现出来。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将地理定义为“绝对的政治要素”^②。斯宾格勒(Spengler)认为,决定事物发展的是近似生物规律的法则,这样的法则导致了文明的兴衰。比较灵活的思想家则将历史解释为各种物质力量运动的产物,一个群体或国家的政策反映的正是构成这一群体利益或国家利益的物质性因素。休斯(Hughes)先生在担任美国国务卿时说过:“对外政策不是建立在抽象原则之上的。对外政策由国家利益所决定。国家利益或是源于国家面临的急迫问题,或是涉及历史视野中的重大事件。”^③这种对现实的解释,不论是以时代精神、以经济和地理还是以“历史视野”的方式加以表述,毕竟都具有决定论的性质。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的行动纲领,他也不是一个固执的、彻底的决定论者,但他仍然认为,存在一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朝着一个必然目标发展的趋势”^④。列宁写道:“政治有着自己的客观逻辑,这是不以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个政党的意志为转

① The concluding words of Buckle's *History of Civilisation*.

② Kjellen, *Der Staat als Lebensform*, p. 81. 可以比较一下 Crow 在著名的英国对外政策备忘录开头写下的一句话:“英国对外政策的总体特征是由英国不可更变的地缘条件决定的”(*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 of the War*, ed. Gooch and Temperley, iii. p. 397)。

③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No. 194, January 1924, p. 3.

④ Marx, *Capital*, Preface to 1st ed. (*Engl. Transl., Everyman's Library*, p. 863).

移的。”^①列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必将在欧洲出现。1918年,他将自己的这一信念视为“科学的预言”^②。

根据现实主义者的“科学假设”,现实就是历史进化的整个进程。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调查和揭示这一进程的规律。历史进程之外不存在现实。克罗齐(Croce)写道:“将历史视为进化和进步的过程,意味着将全部历史视为客观的必然,因此,也就不承认任何对历史的主观评判是正确的。”^③从伦理道德角度批判历史是没有意义的。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哲学将似乎不公正的现实转化为合理的事物”^④。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只有使用历史性标准才能对历史做出判断。除了我们自己经历过的那些历史事件之外,我们对历史做出的评判似乎总是起始于一种假定:历史事件只能是它实际表现出来的样子,不可能以其他形式出现。这一点十分重要。据记载,维尼泽洛斯(Venizelos)在读费希尔(Fisher)所著的《欧洲史》的时候,见费希尔写到希腊人在1919年对小亚细亚的入侵是错误的。他一面露出嘲讽的微笑,一面说道:“任何一个不成功的努力都是错误的。”^⑤如果沃特·泰勒(Wat Tyler)的起义成功了,他就会被视为英国的民族英雄。如果美国独立战争以惨败而告终,美国的开国元勋就会在史册上被一笔带过,被说成是一群疯狂无度的暴徒。最大的成功就是成功本身。黑格尔曾经引用过席勒的名言:“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只有当我们给“强权”一词加上极端限定性意义的时候,“强权即公理”这句十分流行的话语才会产生误导作用。历史创造了权利,因此也就创造了公理。适者生存法则说明,生存者最适合生存。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除此之外,他似乎没有其他的意思。卢卡奇(Lukacs)认为,无产阶级的“正义”是基于其“历史使命”的。在这一点上,他虽然不够严谨,但却是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⑥还有,希特勒认为,德意志民族肩负了历史的使命。

① Lenin, *Works* (2nd Russian ed.), x. p. 207.

② Ibid. xxii. p. 194.

③ Croce, *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 italiana*, i. p. 26.

④ Hegel,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 (Lasson's ed.), p. 55.

⑤ *Conciliation Internationale*, No. 5—6, 1937, p. 520.

⑥ Luka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p. 215.

思想的相对性

但是,当代现实主义的重大成就绝非仅仅反映了历史进程的决定论观点,而是展示了现实主义思想的相对性和实用性。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主要是(虽然不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影响,历史学派的原则被用于对思想的分析;同时也奠定了一种被称为“知识社会学”的新科学的基础,这主要是德国思想家的贡献。于是,现实主义得以表明,乌托邦主义的思想理论和伦理标准远非绝对和先验原则的表述,而是由历史所创造的,是环境和利益的产物,也是为促进利益而服务的工具。正像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所说的那样,“道德伦理很少是事物的原因。它几乎总是一种结果、一种手段,用来使我们自己的利益具有普世的法理权威。我们乐于将道德伦理想象为产生利益的真实原因,实则不然”^①。这是乌托邦主义必须正视的最严厉的批评,因为这一现实主义的批评动摇了乌托邦理念最根本的基础。

从一般意义上讲,思想的相对性长期以来一直得到了人们的承认。早在17世纪,毕晓普·伯内特(Bishop Burnet)就阐述了相对性观点。虽然他的阐述不像马克思那样敏锐,但同样具有说服力。他说:

说到过去的一些内战,大家都很清楚当时一些关于统治问题的流行观念。当要推翻君主体制的时候,我们知道需要怎样表明这样做是正确的。为了便于服务于这一目的,我们会说,就本质而言,统治的根本来自民众,君主只不过是受民众的委托实施管理而已,这是毋庸置疑的真理……但是,后来君主体制复辟……另外一种统治观念出现了。这种观念认为,统治完全是上帝的安排,君主只对上帝负责……现在,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人们有了言论自由,于是又出现了新的一套理念。消极服从被视为完全错误的行为。原来认为逆来顺受是一种义务,现在反对压迫成为光荣行动;原来认为受到伤害时上帝自会主持公正,现在人们有了为自己伸张正义的天赋权利。^②

在当今时代,人们相当普遍地意识到这种现象。戴西(Dicey)曾经就19世纪人们对奴隶制的不同观点写过评论,他说:“信念,坦率地说是诚实的信

^①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1915—1916, p. 302.

^② Burnet, *Essay upon Government*, p. 10.

念,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来自辩论,也不是来自直接的自我利益,而是来自于环境……是环境创造了人的大部分观念。”^①马克思将这种有些模糊宽泛的论述具体化,认为所有思想都取决于思想者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这种观点可能过于狭隘。马克思尤其不承认存在“国家”利益,所以也会低估民族主义在影响个人思想方面的巨大潜力。但是,马克思将思想的根源集中到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上面,这种独特的做法不仅普及了这一原理,而且揭示了它的实质。自从马克思对这个问题作了阐述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思想取决于思想者的利益和环境这一相对性原理。

这一原理适用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理论不能决定事物的发展,发明理论是为了解释事物发展的——这种说法已经十分流行了。“先有帝国,后有帝国主义理论。”^②18世纪英国“在没有阐明自由放任这一新理论的原理之前,甚至在连一个似乎说得过去的理由也没有的情况下,就已经将自由放任政策付诸实施”^③。“自由放任政策在现实中失败之后而不是之前,自由放任主义的理论……才真正地崩溃了。”^④“社会主义在一国实现”的理论是苏联在1924年提出的。这种理论的提出,显然说明了苏维埃政权不能在其他国家建立同样的体制。

不过,一些与理论并无重要关联的事件却会对抽象理论的发展产生影响。

[一位当代社会思想家写道,]在政治思想发展过程中,现实事件的影响一点也不亚于理论观念的影响。制度的成功与失败、坚持某些理论的国家们的获胜与战败,不断地使这些理论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得到新的力量、产生新的决心。这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条规则……世界上的哲学是哲学家的话语。权威人士告诉我们,这些哲学家像常人一样,也会头疼脑热,也会受到最近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影响,也会受到知识界流行做法的诱惑。^⑤

19世纪60、70年代,德国实力大增,足以使下一代领衔的英国哲学家成为坚定的黑格尔主义者,包括凯尔德(Caird)、T. H. 格林(T. H. Green)、博赞基特(Bosanquet)、麦克塔格特(McTaggart)。后来,德国皇帝发给克鲁格

① Dicey, *Law and Opinion* (1905 ed.), p. 27.

② J. A. Hobson, *Free Though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 190.

③ Halévy, *The Growth of Philosophic Radicalism* (Engl. Transl.), p. 104.

④ M. Dobb,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p. 188.

⑤ L. T. Hobhouse, *The Unity of Western Civilisation*, ed. F. S. Marvin (3rd ed.), pp. 177—178.

(Kruger)的电报和德国海军发展计划使英国哲学家改变了主意,认为黑格尔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伟大。1914年之后,没有一个知名的英国哲学家敢于打出黑格尔的旗号。在史学方面,1870年之后,斯塔布斯(Stubbs)和弗里曼(Freeman)极力为英国早期历史塑造一种坚实的条顿基础。甚至在法国,菲斯泰尔·德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为了维护法国文明的拉丁渊源,也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但是,在过去三十年里,英国历史学家却在不自知地尽量淡化英格兰的条顿根源。

不仅仅是专业学者受到这样的影响,舆论同样受到这些思潮的主导。法国人生活轻浮、不重道德,却被19世纪的英国人奉为楷模,因为拿破仑仍然是他们记忆中的英雄。伯特兰·罗素写道:“我年轻的时候,法国人吃青蛙,所以被英国人称为‘青蛙佬’。但是,到了1905年,英国和法国结成协约联盟,似乎法国人便不再吃青蛙了。至少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人使用过这一蔑称。”^①过了一年之后,“谦恭的小日本”却经历着另外一种变化,一跃成为“东方的普鲁士”。19世纪,英国公众流行的看法是,德国人高效文明,俄国人落后野蛮。但是到了1910年前后,英国人却认为:德国人(其中大部分是普鲁士人)粗野、蛮横、心胸狭窄;而俄国人则具有斯拉夫精神。大约在同一时期,俄国文学开始在英国流行起来。这是英俄两国政治修好的一个直接结果。布尔什维克革命在俄国成功之后,马克思主义在英国和法国的影响并不明显,但1934年后这种影响却迅速加大,在知识分子阶层尤其如此,原因是当时英国人和法国人发现苏联很可能成为对抗德国的军事盟友。事实说明,大多数人在被问及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断然否认是以这种方式形成自己的观点的。正如阿克顿(Acton)很久之前所说的那样,“没有比揭示观念的形成更令人气恼的发现了”^②。所以,对思想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必然是一种下意识的过程。

根据目标调整思想

思想不仅与思想家的环境和利益密切相关,也具有实用意义,因为思想是直接为实现思想家的目标服务的。正如一位机敏的学者所说的那样,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不和谐的经验会被以实用的方式、根据具体的目标暂时地

^① Bertrand Russell, *Which Way Peace?* p. 158.

^② Acton, *History of Freedom*, p. 62.

予以调整,真理不过是对这种调整后的经验的认知而已”^①。思想的目的性特征在前面一章里已经讨论过。所以,在这里仅举几个例子,说明这一现象在国际政治领域里的重要意义。

为贬低敌人或潜在敌人所发明的理论是思想目的性的一种常见的表现。至少是从旧约圣经时代开始,一种司空见惯的方法就是将敌人或准备攻击的对象贬低为上帝眼中的劣等人种。从古至今,种族理论无一不是属于这个范畴。一个民族统治另外一个民族,一个阶级统治另外一个阶级,其理由都是被统治者属于精神和道德上的低劣者。在这类理论中,性变态和性侵犯都被归罪于低劣种族或低劣群体。比如性堕落,美国白人将其归罪于黑人,南非白人将其归罪于非洲黑人,居住在印度的英国人将其归罪于印度人,德国纳粹将其归罪于犹太人。在俄国革命初期,对布尔什维克最流行和最荒唐的诋毁是说布尔什维克提倡性滥交。以性侵犯为主的暴行往往是伴随战争的产物。在侵略阿比西尼亚前夕,意大利发表了一本关于阿比西尼亚暴行的官方绿皮书。阿比西尼亚在日内瓦的代表正确地指出:“意大利政府决意征服并摧毁埃塞俄比亚,于是便首先开始诋毁埃塞俄比亚。”^②

但是,这种现象也会以比较隐蔽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不易被人觉察。1908年3月,在外交部的一份会议记录中,克劳(Crowe)的话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

对于德国(前普鲁士)打算与之交战的国家,德国政府总是不遗余力地营造一种对这个国家的深仇大恨。毫无疑问,德国正是以这种方式滋养了德国人对英国的极端仇恨,使他们认为英国是自私和贪婪的化身,是毫无良知的妖魔。这种情绪现在激荡了整个德国。^③

这一分析既准确又深刻。但令人奇怪的是,克劳虽然精明过人,竟也没有觉察到这样一点:此时此刻他说的这番话所起到的作用,与他指责的德国政府的行为如出一辙,只不过他的听众是英国为数不多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而已。如果认真阅读克劳在这一时期的备忘录和讲演稿的话,也会发现一种明显的努力,试图营造一种对英国未来敌人的“深仇大恨”。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它说明我们很容易觉察到别人思想中的主观目的性特征,但同时又总是断定自己的思想是完全符合客观事实的。

① Carl Becker, *Yale Review*, xxvii, p. 461.

② *League of Nations: Official Journal*, November 1935, p. 1140.

③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 ed. Gooch and Temperley, vi. p. 131.